

新时代故事的精彩演绎

曾丽琴

黄荣才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以描写基层干部的题材最为突出。他也将这些题材写成系列小说，它们几乎都有一个名叫吴高仁的主人公。其近作《大河东流》可以说是吴高仁系列中短篇的扩展与延伸，但由于采用了长篇小说的叙述体裁，小说还是呈现出与中短篇不一样的风貌与内涵。

小说从九十年代的农贸市场经济写到二十一世纪初的工业园区开发，之后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以及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与脱贫攻坚战。正如“大河东流”这一恢宏的篇名所示，小说呈现了中国时间这二十几年间正向的汨汨流动——它始终向着日出的方向，不停地奔涌，并将继续奔涌。因此，小说的最后作者并没有封闭住叙事，而是以吴高仁稍微抬高的目光开启更加灿烂宏阔的未来：“阳光打在对面的山峰，山峰明亮，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吴高仁在心里念叨着。”

主人公吴高仁自然是黄荣才重点形塑的人物，事实上，也正是吴高仁这一形象塑造的成功，才使得整部小说在众多的同类型小说中凸显出来。在塑造吴高仁这一人物时，黄荣才主要突出人物的两个特点：其一，他是一名基层干部；其二，他的坚持与担当。

吴高仁是一名党的基层干部。他从县委宣传部的干事做起，到乡长、镇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

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副县长。他与百姓距离最近，也最了解百姓的心理与需求。他最清楚百姓的事情要怎么处理，也能包容百姓的种种不足。小说中东岭新村事件与陈高丁墓穴被破坏事件的妥善快速处理就都显示了吴高仁对百姓的充分了解与对民情的清楚把握。百姓觉悟的参差不齐使得基层干部的工作较难开展，但吴高仁并不抱怨，而是始终将百姓的事情放在心上。他认为百姓口碑是领导干部执政水平最直接的体现：“政府官员和群众口碑这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就是做事，做实事，做好事。”

小说也呈现了基层干部的其它工作困境，比如在以往某些政治生态较不清朗的情况下，他们常常要为自己乡镇的项目能在众多同类项目中获得批准与拨款到省市蹲守、请求、争取。吴高仁多次感慨：“自己好像是建筑工地的民工。别看在县里科级干部是领导，人五人六的，到了省城谁认得你，什么都不是”“这地方官员也就看着风光，其实责任重大，压力也大，所以过劳死、未老先衰等大多是地方官员”。小说中吴高仁不少项目的成功都得益于商务部干部王明娟的认可和帮助。这从另一方面促使读者思考有些中央政策与地方执行之间存在偏差的原因。

当然，工作困境越是突出，吴高仁二十多年在基层的坚持与担当

就越是难得。他告诉王明娟：“当年我刚到田山乡的时候，曾经有个晚上，我自己一个人在山村道路上行走，看到落后得有点荒凉的村里，我对自己说：我要尽自己所能，做点实事，改变别人的生活，让一些人的生活变得好一点。后来到哪里，我都坚持这一点。”在从事基层工作的二十多年中，他从没有忘记自己的这一初心，一直“遵从内心做事”。这份初心也保证了他执政做事所持的“度”：对于田东镇财政所所长在交接时和即将卸任镇长联手大肆批发镇政府欠债白条一事，他批评“此人不仅不可用，还要追究责任”，因为“做人也好，做事也好，都要有个度。越界了，别无选择”。在县工业园区招商时，他拒绝了一个可带来高税收但会污染环境的项目，他认为“每个人心里还是要有个坎，才不会漫无边际”。在县历史文化名人陈高丁的研讨会上，他反复思考并提出一个问题：“陈高丁数次平调还保持清廉，是内心约束还是制度规范？”事实上，吴高仁用他自己的行为很好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党的干部在执政做事的过程中首先要有内心约束，也即要“心中有戒”，然后也要“行为有边”，就是要靠制度约束。吴高仁的初心、情怀与境界影响了身边的一群基层干部，刚入职不久的小丁、小高这样的年轻人都以他为榜样，而对工作冷漠已久的陈东明因为

“骨子里佩服”他，也在他的感召下重新热血沸腾起来。

晚清以来热衷描写官场上“潜规则”，把政治场域的种种关系都简化为阴谋与权术的“官场小说”，而是在“非常严峻的现实生态里，寻找一种价值的正能量，寻找一种前进的力量，寻找一种新的道德，寻找一种破解困局的智慧，寻找一种能够和老百姓同呼吸、共命运的先进文化”。《大河东流》对这一创作传统做了很好的承继，正如《中篇小说选刊》所推介的，它“具有向上的力量和积极的主题，是新时代福建故事的精彩演绎。”



《大河东流》
黄荣才 著
海峡书局2020年6月版

张爱玲的“天才梦”

江飞

印象里的张爱玲，身着旗袍，头微昂起，仿佛睥睨人间的“流言”，又好像不屑浪漫的“传奇”，她聪慧、敏感、清高，而又冷艳、孤傲、俗气，一正一反的两种力量总会她身上完美统一。其实，并非“完美”，只是有些“古怪”，正如她开篇就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这样说自己，便是古怪得很了，然而，对于一个“天才”而言，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一个开诚布公地说自己是古怪天才的女子，除却狂狷之士，这份从容和气度倒是世间难得的。

在《天才梦》这篇处女作中，张爱玲以平实而沉静的口吻，回忆起自己“天才的怪癖缺点”，这种直言不讳的坦露，是散文的文体特性所在，不似在小说中，她总可躲在人物和故事的背后，旁观别人的悲欢际遇，并悄悄地抛以冷眼。于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两个世界里的“我”：一个“我”不会削苹果，不会织绒线，不识路，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处处受痛苦；另一个

“我”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极为敏感，懂得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笛，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顶的绿叶。对于她而言，“生活”是奇妙的，她所不擅长的只是那些待人接物的常识而已，而其所钟爱的却是将生活诗意化，或者说过一种艺术化的生活。由此而来的矛盾，如同她和她母亲之间的矛盾，怀疑多于相爱，疏离大于靠近。或许是因为家道中落，父母婚姻的不幸以及二人中西对立式的巨大差异，给幼时的张爱玲就造成了心理的阴影，使得她的一生都宛若在“分裂”的两条轨道上并驾齐进。

张爱玲虔诚地热爱着琐碎的日常生活，无论是在散文中，还是在小说中，她都关注那些乱世中不幸的男女（如《倾城之恋》），那些在烟火里摸爬滚打的卑微小人物（如《公寓生活记趣》），她的聆听、打量和描摹都是实在而富有趣味的；她又试图超越这世

俗的生活，用自己设计制作的服装“固执地”将自己包裹起来，在电影和音乐的光影声响里隐匿起来，将自我与他者隔绝开来，她不相信母亲的警告，更不相信那个“快乐村”的乌托邦，因为在她书写的现代与传统纠葛的双重世界里，充满着自私、冷漠、势利、情欲、嫉妒、疯狂，那些残酷的生命与人性的挣扎，都在她悲悯的观照里成为人生的底色。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当我们最后与这经典之句遭遇的时候，我们或许已明白了：这篇“天才梦”其实并非张爱玲早期的个人“自传”，也不仅仅预兆着她此后如此这般的生命历程（比如与胡兰成的爱情），她要告诉我们的，其实是一种梦里梦外、一雅一俗的两重世界，两种生活。生命如光滑之袍，充满着丝绸般的韧性和质感，因其华美而值得珍重，然而，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在这美好遮掩之下，却爬满了令人烦惧的跳蚤，

这种非释非道、近释近道的生命观足以让人惊愕，让人沉思，而这种不可理喻的比喻，恐怕也惟有张爱玲所能创造。如评论家所言：“生命之乐与生命之悲同时潜入物质拥有富足、理智发达、沉浸于现代文明中的人们的心灵，作为一个女性，仿佛更能体验到这种大掺和的滋味。张爱玲散文的底色便这样铺就，无论她多么俏皮地道出她的欢娱，机敏、富丽地设色用词，最终不由自主地要流露出她的悲音。”（吴福祥《<张爱玲散文全编>序》）这正是无法规避的宿命，抑或“不可承受之轻”；这是一种个人化的自况白描，更是一种集体性的人生隐喻。对于身处现代俗世中的我们来说，或可效仿她的，恐怕也惟有“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了罢。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若秋叶之静美。在这之间，不过是苍凉的“梦”而已。如果我们原谅了瓦格涅的疏狂，那么，我们更会原谅一个“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的张爱玲。